

□□ 农民日报·中国农村网记者 陈艺娇

“从当地老乡的身上,老师学到的不只是烧砖、盖房之类的生活技能,更重要的是中国农民所特有的朴实坚韧的品质,以及如何在困境中面对生活的挑战。农村生活对他后来的社会学研究影响很大,促发了他对现实问题和农民群体的关注。”在采访中,叶鹏飞这样回忆他的老师——著名社会学家、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李强。

于国内社会学界,李教授的价值很难用几句话衡量。自1985年硕士研究生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并留校任教,他深耕贫困研究、社会分层、城镇化发展等领域,特别是在农民工等群体的观察研究上独树一帜,提出了很多具有创造性和实践意义的观点成果。研究脉络紧扣中国社会变迁所面临的一个个转型问题。

在这个过程中,1999年,李强教授进入清华大学任教,主导了清华社会学系重建,先后担任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院长、社会科学学院院长,2018年入选清华大学首批文科资深教授。直到2021年6月,李老师在清华讲完最后一门课,那年他71岁。

2023年12月的一天,李强教授因病去世的消息传来,惊闻噩耗的同侪亲友、同事学生们扼腕痛惜。为了回顾与纪念这位社会学泰斗躬耕学术的一生,记者采访了李强教授生前的学生,追忆李老师,对于很多学生来说,也是重回那段澄澈温暖的读书时光。而在他们的回忆里,我们也许能够勾勒出这位学者更有温度的一面。

上山下乡与底层关怀

2005年,应一本杂志的邀约,学生叶鹏飞曾为老师写过一篇学术传记《理论创新与社会关怀——李强教授的社会学人生》。为了更好地梳理历史细节,他专门与老师聊了聊“以前的事”。

李强出生于北京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中国早期采矿和有色金属方面的专家。小的时候,父亲经常带着他做实验,他也觉得“很好玩”。虽然没有学成理工科,但是理工科要求的假设验证模式、拿证据说话的逻辑对他日后在社会学中的实证研究取向产生了深远影响。

1968年,18岁的李强从北京四中毕业,正逢上山下乡的年代,他与同学们一道远赴黑龙江宝清县参加生产建设兵团的劳动,在这以后的9年时间里,他学会了种地、烧砖、伐木、盖房,抡镐头和扛麻袋也不在话下。他亲眼看到农民在荒山野岭中生火、磨豆腐、采蘑菇,高超的生存技能和顽强的意志力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与当地的老乡一起生活和劳作,他也逐渐了解了他们心中的真实想法和需求。

在农村的9年,是李强作为“城市学生”成为农民的9年,也是他开始真正与农民群体建立联结的时期。他曾说:“中国就是一个农业为主的社会,农民是主体,不了解农村和农民怎么研究这个社会,怎么能理解他们的思维方式呢?”

1978年,恢复高考以后,由于中断学习的时间太长,数理化专业课差得太多,又因为年龄比较大,选择专业范围有限,综合考量之下,李强报考了人大国际政治系,从本科到研究生毕业,从事国际政治学习研究长达7年。而当1985年选择留校院系时,他遇到了刚刚从英国进修回国,在人大创建了社会学研究所的郑杭生教授,表达了自己想要加入社会学系的愿望,“去研究一些中国社会本身的问题”。

“我想,老师经历了上山下乡,他对于贫困问题以及城乡分割的理解会更加深刻,在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对社会成员的影响方面体会得更加明显。”对于老师的这一学术转折,叶鹏飞有自己的理解,“在这种特殊的时代背景下,他逐渐发现,相对于宏观而遥远的国际政治学,研究中国社会本身的问题更加重要。”

务实、求真

叶鹏飞于1995年本科进入人大社会学系,2003年又考入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跟随李强教授攻读硕士、博士学位,是教授比较早期的学生之一。在老师身边学习近10年之久,他曾在心里默默盘算着老师的课题脉络:贫困与城乡差异、农民工与城市流动人口、城镇化发展问题、社区治理与养老……关注的每一个领域无一不是对当时社会转型中现实问题的映射与底层群体的关照。

在对农民工群体的研究中,李强教授曾提出“精英循环”的研究视角。“他认为城市农民工是农村中典型的精英群体,与未流出的农民相比,他们具有年龄、教育等多方面的优势。”基于这个理论,2001年,他发表了《给“底层精英”以上升渠道》的论文,提倡开辟流动渠道,使农民工中的高素质者拥有上升到上层群体的机会和条件,取消对于城市农民工的种种限制,赋予他们以自由竞争的就业机会。“这不仅有利于保障农民工群体本身的利益,对于整个社会的稳定发展也是非常重要的。”叶鹏飞说。

在这个理论框架之下,2010年前后,李强教授提出建议恢复上世纪50年代确立的“八级职业技术分层制度”,目的是通过调整农民工的技能、技术认定,赋予高级别技术工人与之相应的工资待遇,最终让农民工向中产阶级跃升。直到2022年4月,人社部印发了《关于健全完善新时代技能人才职业技能等级制度的意见(试行)》,在原有的“五级”技能等级基础上,往下增设学徒工,往上增设高级技师和首席技师,延伸和发展为新“八级工”制度。

“你看,其实我们社会正在经历转型,也正在积极调整,很多变化开始慢慢发生了。”叶鹏飞说,“这其中的推动力是有老师的一份功。”

“如果一个人真诚的学问背后可以读到他的性格、他的关怀,那么我在李老师的著作中,读到的是中国老百姓和他们并不容易的日常生活,读到的是当下社会大多数人的真实处境与实际需求。”2021级博士研究生吴振华在他的文章中写道,“他的学术,最关心的是中国这个有着超大规模人口与地域的老国家,在超短时间内实现国际上最大规模的工业化与城镇化的进程中,如何真正完成其现代化转型。”

“老师分析社会问题的眼光非常敏锐,能够在融

农村九年,让他的学术更有温度



社会学家,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李强(1950年5月17日—2023年12月12日),曾任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社会学系主任,曾兼任清华大学民生经济研究院院长、清华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曾任全国基层政权建设和社区治理专家委员会成员,是新时期中国社会学学科的重要奠基人之一,也是社会分层与流动、城镇化与城市研究、社会治理等研究领域的领军人。著有《社会分层与贫富差别》《农民工与中国社会分层》《社会分层十讲》《多元城镇化与中国发展》《当代中国社会分层》《新清河实验》等二十余部著作。



2001年,李强教授(右一)在做社会学调研访谈。

“中国就是一个农业为主的社会,农民是主体,不了解农村和农民怎么研究这个社会”



图片来源: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

做事、做研究,所以在很多方面都能看到持续的创新成果。”

内方外圆

本科毕业后,叶鹏飞曾在西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工作了4年。有一次,一位宣传部的领导赞许地称他,为人“心胸开阔”“内方外圆”。直到多年以后走上其他工作岗位,慢慢回味着这句评价,他感到这正是老师多年潜移默化的影响在他身上产生的印记。“这是我们从老师身上学会的东西,也是我们一生的财富。”

“心胸开阔”“内方外圆”也是叶鹏飞心目中老师一生形象的写照。“棱角”在内,是指他在学术追求,为学态度上能够坚守正道;而“谦和”在外,则指他在学术生涯之外多了一份柔和色彩与人格魅力。“作为院系的领导和带头人,无论在哪里,李老师都能把大家团结起来,整个团队的凝聚力还是非常好,这其实是不容易的。”叶鹏飞说,“像以前举办活动的时候,学界也不乏很多特立独行,极具个性的学者,在老师的协调组织下,还是能够聚在一起做事做学问。”

“曾经有个学界的朋友开玩笑说,咱们都是‘有死角的’,只有李老师堪称‘没有死角的人’,就是说这个人几乎找不到缺点,跟他在一块做事你会觉得很放心。”叶鹏飞说。

说起李老师的这种个性,吴振华提到了一件事。2021年校庆日的时候,清华大学邀请了几位文

科大学教授进行讲座,李强教授的讲座最后是在介绍“新清河实验”,当时还留了个尾巴没讲,但他看讲座的时间已到,便停下来结束了。“这就是李老师的性格。”他说,“他从不会因为自己在学术上得到他人认可,就将这份影响力扩散到学术之外的领域。”他认为,老师能将社会学研究的事业坚持一生,这份难得的“平常心”也许是最大的前提。

在学生们的印象里,生活中的李强教授更是一个极其朴素的人。“也不讲吃、也不讲穿”,曾经有个同院系的老师和学生们聊起他,说是“兔子吃啥他吃啥”,而且吃饭极快,经常5分钟吃两口就走;穿衣也很随意,有次去广州的城中村入户调研,“站在一群农民工中间,李老师就能融入其中,一点也不违和。”叶鹏飞回忆,“我们都觉得这与他早年在农村的经历有关。”

虽然自己不讲究,但对于学生的事,李强教授没有不用心的。比如在调研开始之前,提前和当地的管理部门沟通好,为学生们开展入户访谈做好铺垫;学生在就业期间遇到困难了来找我,他也是有求必应,积极帮忙推荐。“凡是关乎他人的事,他落实得很快,从不耽误人……即使是自己学生帮着做点事,他也觉得不好意思,会几番道谢。”吴振华说。

旧岁的雪化掉了,元月到来,转眼又是崭新的一年。也许,对于他的学生们来说,这个“起点”因为他的离去又有了新的意义,好像每一次回望那个岁末的雪天,都会有一双深邃又温和的眼睛,目送他们的新征程,嘱咐他们“永远真诚,永远见贤思齐,永远心系他人福祉”。

煤油灯捻子下的读书少年(节选)

1968年7月,我从学校安排“上山下乡”,坐火车、汽车一路颠簸,花了三天时间辗转来到了黑龙江边境距离乌苏里江上的珍宝岛不远的地方,应该是属于虎林县,这里在编制上是沈阳军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一个连队,其实就是一个村庄,在那里我一待就是9年。当地的冬天一般是零下20摄氏度,寒冷的时候是零下40摄氏度。夏天就是蚊子太厉害,铺天盖地,一头老牛走过去,蚊子就“嗡嗡”扑过去,再飞起来就是一片红色的,落在墙上一面墙都是红色的。一个从小生活在城里的青年,父母一直在身边,虽然也下乡劳动过,但没有去边远的村庄独立生存过。突然有一天,没有父母了,就你一个人被扔到村里面,心里面特别震撼。

黑龙江的冬天长达半年,每年10月就下大雪,到第二年5月以后土地才化开解冻,当地人把熬过冬天叫“猫冬”,生活很枯燥,我最苦恼的事就是没书可读。当时我们也带了一点儿书,但带的书都被我们迅速读光了。其实我带的不多,同学们带的书挺多。因为我父亲的书都是各国文字的书,关于采矿的各种专业书,我也看不懂,所以带的书不多。有个同学叫张弦,他带的书很多。其中有一部年代久远的线装本,插画版《聊斋志异》,由于线装书有好几十本,我们都特别喜欢。但是这些书很快都被我们读完了。怎么办呢?后来,我们发现了村里的一个“读书宝库”。以前村里有个图书馆,“文革”期间被砸了。村里的文书叫路国起,他特别聪明,就把这些书都藏在了家里,使得这些书幸免于难。我们就不断从路国起那里借书看,但很快就看完了,知青之间就想方设法找书看。

那个时候,北京知识青年相互之间都很有同情心,也都非常渴望读书。记得是1969年有一次去黑龙江边境的“迎春”火车站,迎面遇到了一个北京知青,于是就聊起来,他说他叫郑也夫,是北京八中的。我们就这样认识了,成了很好的朋友,到现在已经50多年了。当时他被分派到离我的连队30多里的种畜站工作,我有时就搭车去他那里。郑也夫也是读书无数的人,是个很纯粹的文人,他那里还有其他知青,我就常去他那里借书。

但是僧多粥少,一本书好知青轮流阅读,一本书在手里最多也就是两三天,因为后边还有很多排队等着呢,一本好书,很多人看过,最后书页都卷起,需要小心翻页否则就破碎了。当时我们白天劳动,晚上就点着煤油灯就着微弱的灯光读书。那时很少有电,我们拿一个小瓶子,棉花捻子伸到油里去,煤油灯点起来只有巨大一点儿火光。我们只能在晚上拼命地读,因为白天要劳动。白天有时候,倒在田地里就睡着了,不眠不休实在太困了。

从1968年到1978年,读书大体是这样的。每个人都拼命看,拼命读,开卷有益,什么书都读,也不分类型,只要是本书就行。今天读《卓别林——不朽的流浪汉》,明天可能就是《安娜·卡列尼娜》,后天可能就是《电工原理》什么的。读什么书不由你的兴趣决定,由有书和没书来决定,那时候的书实在非常宝贵。

1977年,我27岁时终于回到了北京,我的父亲也平反了,从此全家在北京团聚了。回来之后,我没有工作,等着街道分配工作。当时,由于待业的年轻人太多,等了很长时间也没有什么工作机会。于是大家就四处找关系,当时我有一个亲戚在北京人民汽车厂,他说你来我这里吧,可以当汽车司机。我去了以后才知道,要从售票员开始做,但什么时候能让你学车、开车也不知道。我就在320公交车上当售票员。售票卖了两个月,到四五月份的时候,听说又有高考了,我就去准备考试了。7月考试,语文、数学、政治、外语、历史、地理6科考了3天。那时候复习没有参考书,只能拿着笔记本东打听、西打听,到处去找题、抄题来练习。尤其是数学题,你自己编不出来,得看人家编的题。当时考试我外语考得最好,在北京市是前几名,可惜的是当年外语成绩只作为参考分,不计入总分。就这样,我考上了当时中国人民大学的国际政治系。

我在人大读书的时候,当时人大图书馆的藏书还不多。我就经常跑到北海公园旁边,当时藏书最多的北京图书馆(现为国家图书馆)去借书。我跟郑也夫频频在北京图书馆碰到,他也是个读书迷。我自己能申请到一个借书证,我父亲也可以办一个。当年主要都是外文书,一个借书证一次可以借走3本外文书。这样,我用两个借书证,一次能借走6本外文书,不到一个月读完了再去借。每次从人大到北海公园南门,还是很远的,春夏秋冬、周而复始,我就这么看书。

刚上大学的时候,我学的还不是社会学。1979年,当时东四的北京美术馆(现为中国美术馆)正在展出大量改革开放之后的进口书籍,展会上有一架一架的外文书。我当时看到有一架书的归类是“sociology”,翻书,图文并茂,觉得太有意思了。慢慢地,我对社会学产生了极大的兴趣,阅读了很多社会学著作。9年的下乡经历也让我对广阔的农村社会有了更多的“参与式观察”,让我深切体会到了中国社会的广袤和复杂。我于1982年本科毕业,接着念了3年研究生。毕业之后,机缘巧合,我在郑杭生老师的邀请下,留校从事社会学的教学和特殊年代的生活经历,让我逐渐与社会学结缘,“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之后一直在这条路上辛勤耕耘,学习不辍。

我们这一代人生活的历史时间和碰到的历史事件太特殊。我们的读书经历,是与新中国的发展交织在一起的。在动荡而艰难的岁月里,求之不得、如获至宝的读书经历是我个人成长中最浓重的笔墨,是我人生命运发生转变的关键点,也是整个国家和民族从“读书无用论”到尊重知识、笃信好学的态度之变迁、之发展、之成长的缩影。

李强
2020年12月